

抓典型上的严重教训

这是《山西日报》7月9日发表的一篇文章的摘要。《山西日报》还加了编者按语说：“这篇文章所指出的错误做法，很多都是过去本报宣传报道大寨、昔阳时存在的问题。我们愿意和广大读者一道，共同总结这方面的经验教训。”

——编者

的大国，情况千差万别，怎么能够用一个“山区建设”的典型去号令全国、指挥一切，去套所有的社队呢？这种削干万只“足”去套一“履”的作法，怎么能使我国的农业放开脚步前进呢？

某个地方和单位成为先进典型后，别的地方即使工作再先进，经验再好，都得跟在“红旗”的屁股后面走，甚至连社员的分红和吃粮标准，也都不能超过“红旗”单位；“红旗”单位即使再有缺点，或者已经落后了，也不准别人批评指出。这个“不”字。

应当用辩证的观点来看待先进和落后的问题，不能把先进典型永远固定在某一个单位，把“红旗”永远插在某个一个山头。对于先进典型来说，要看到自己的弱点、缺点和不足，欢迎别人超过自己，不能夜郎自大，老子天下第一。更不能用自己的“红旗”牌子压人，嫉妒别人先进，让别入永远诚惶诚恐地拜倒在自己的脚下。有的地方为了保住“先进”称号，保住“红旗”牌子，实际上是某些人为了保住自己的面子和“乌纱帽”，不惜欺上瞒下，弄虚作假，那就更犯错误了。比如，“全国第一个大寨县”昔阳县，从1973年到1977年，五年中共虚报粮食产量2.7亿多斤，比这五年实际产量多报了近24%，平均每年虚报5,400多万斤。这种“先进典型”，怎么能够叫人服气呢？别的地方又怎么能够学习呢？

给典型以大量的钱和物，使典型在客观条件上远远脱离了一般水平，走向特殊化，完全失去了典型的意义。比如对昔阳县，据有关部门反映，从1966年以来，姑且不算国家拨给的建筑、化肥等物资，仅平中地区支援的农田水利基本建设款就达2,560多万元，平均每年增加一亩水浇地要花600多元。最近中央报刊披露的那个“西水东调工程”，至今已耗去国家投资5,000多万元，还没有收到一点效益；即使能够收到一点效益，象这种用大量金钱“喂”起来的“先进典型”，其他地方能够学得起来呢？

推广先进经验不能靠棍棒。靠权力、靠压力、靠棍棒来推广典型的做法是错误的。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前些年在学大寨运动中，用行政命令和政治压力，甚至用“专政”的办法，强行推广大寨、昔阳的一整套经验。例如，提出什么“学不学大寨，真学还是假学大寨，是真革命和假革命的标志”，“是农村两个阶级、两条道路、两条路线斗争的焦点”，“对大寨的感情深不深是一般的问题，是对毛主席、党中央的态度问题，立场问题”，“要在政治上和大寨保持一致性”等等。也就是说，一切都要以大寨的是非为是非，以大寨的标准为标准，连上级领导机关也要看其眼色行事。再如，用高压手段反逼批判什么“假学”、“明学暗反”，乱给各级党委和广大干部群众扣“民主派”、“走资派”、“反革命”等帽子，把所谓“反大寨”作为一条棍子到处打人，从娘子关内一直打到娘子关外。又如，在“学大寨赶大寨，手中无权学不开”的口号下，从基层干部中乱抓所谓“五种人”，从各级领导干部中乱揪。

和大寨没有感情”的干部，从各级党委班子中乱清“三反一砍”的“帮派势力”，并且从昔阳派出大批干部到外地和上级党委部门去掌权。在这种乱扣帽子、乱打棍子、大批大斗的形势下，致使相当多的干部和群众避贤就佞，有的被批斗，有的被下放，有的被开除党籍，有的被撤销职务，有的被逮捕法办，有的甚至被整死，造成了严重的恶果。

籍，有的被撤销职务，有的被逮捕法办，有的甚至被整死，造成了严重的恶果。

学习先进经验不能照葫芦画瓢，不能搞“一刀切”。如“大寨怎么干，你们就怎么干”，“昔阳怎么干，你们就怎么干”；“要不‘不学假’，‘不走样’，‘不允许借口’‘情况不同’而对先进经验抽象肯定、具体否定”；大寨、昔阳搞大队核算，其它地方也都要搞大队核算；大寨、昔阳搞“一一定四评”；其它地方也都要搞“一一定四评”；大寨、昔阳“关闭集市贸易”，“割自留地尾巴”，“砍家庭副业”，其它地方也得“关”，也得“割”，也得“砍”；还有什么几“出勤”几“送饭”、“早上五点半，黑夜加班干”等等。这样，就逐渐形成了一种反常现象：“照抄照搬是真学，因地制宜是假学”。这样的“一刀切”，切掉了唯物辩证法，切掉了广大干部和群众의积极创造精神，切断了农民致富的广阔道路！

在学习推广先进经验时，还有一个正确对待先进经验与党的方针政策的问题。先进经验不等于党的方针政策。不能把先进典型的经验同党的方针政策混为一谈，更不能把两者的关系搞颠倒，用某个先进典型的经验代替党的方针政策。粉碎“四人帮”以后，有些地方有的领导人继续用大寨、昔阳的经验代替党的方针政策，甚至对抗党的方针政策，固然有对党的方针政策不理解的原因，但主要是由于没有从林彪、“四人帮”极左路线的影响下解放出来，对大寨、昔阳的经验许多经验并不是什么“先进经验”，是极左路线的产物不承认。至于个别人拉大旗作虎皮，借口“学大寨”对抗党所制定的正确路线和方针政策，甚至公然叫嚷“碰到南墙也不回头”，那就不是什么认识问题了，就不是党纪国法所不容许的了。

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证明：搞典型，推广典型，只有坚持正确的政治路线，在马克思主义的唯物论和辩证法的指导下，才能做好。这是我们一条最深刻的经验教训。

李国庆 杨玉印（据新华社社）

不要忘记人民

——大兴县榆堡公社党委书记张洪山访问记

本报记者 丛林中 段存章

在埋头苦干、默默无闻的人们中间，有许多有见识，有魄力，能创一番事业的人物。张洪山就是其中之一。

一、偶然得来的采访线索

我们听说张洪山这个名字，纯属偶然。

去年十一月里，我们到北京市大兴县了解农村开展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情况，县委的同志简要地介绍了榆堡公社党委书记张洪山的几件事，给我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。一九七四年张洪山上任不久，正当全县大批小生产、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时候，张洪山提出榆堡公社要大办工业，要抓钱，把一个分管厂改成了渔具厂，因为生产渔具每年能拿到二十万元的利润。榆堡公社有一个北京下地的工程师，让他种地，草苗不分，但是他一听拖拉机响，就知道哪儿出毛病了。还有一个规划右派，在北京渔具厂干过，懂行，公社生产渔具正缺这样的人手。张洪山拍板说：“凡是能给咱们社找到挣钱门路的，只要最近没做过坏事，都可以用。”

这几件事，现在看来也许顺理成章，不足为奇。但是，它们发生在“四人帮”十分猖獗的时期，我们不能不感到惊奇，感到难能可贵，感到张洪山这个人的思想有过人之处。

于是，我们决定到榆堡公社去访问张洪山。初到榆堡，又听说社里流传着张洪山可能要调走的消息，惹得许多社员心里很不安稳，直到证明是讹传，这才放了心。这件事更使我们想深入了解张洪山是怎样一个人。

二、张洪山思索着

一九七四年，张洪山来到全县穷得出名的榆堡公社，他的老家在邻近公社。这一带可以说是他的家乡。二十年后重返故乡，他感慨很多。他步行察看了公社六十三个生产队，看到这里的自然面貌和老百姓的生活，二十多年来没有很大的变化，心里说不出来的压抑。沙包、大沙包，一个接着一个，刮风来，遮天蔽日。白花花的盐碱地，一片又一片。没有树，土地光秃秃的。没有路，一到雨季大车陷在泥里，种西瓜要人挑出来。没有新房子，仿佛还是他少年时的老样子。坐着永定河和天堂河，渠不知修了多少，挖了改，改了挖，就是吃不上麦子。张洪山看到这些，心煩意乱：解放二十五年了，为什么这里的大沙包一点也没有变化？一个共产党人站在这些沙包面前不应该感到惭愧么？

经过一番调查和讨论之后，张洪山主持制定了一个五年规划，决定要办四件大事：平沙、挖渠、修路、栽树。可是人们信心不足。

有人议论说：“新官上任三把火，哪个领导来开头都是豪言壮语。下文呢？没有了。”也有人说：“不能全靠领导，咱们这榆堡，谁来也没治！”老百姓要等看。张洪山很理解他，他反复思索着，要改变榆堡的面貌，第一要有信心，第二要有人，第三要有钱。

张洪山对我们说：“这就是我在县里讲的下决心要办那几件事的原因，信心很重要，但是干部是关键。用人得当，又有了生财之道，群众就会有信心。”

三、让人当干部

张洪山一上任首先碰到一个难题：干部想辞职，百分之二十的人要求调走，人心不稳。他访问了一部分，从前逃荒要过饭、当过八路军的老支部书记，有一批人都被开除党籍了。张洪山想：要想把榆堡的穷字撇掉，当务之急是选贤任能，找一批有点雄心壮志的人一块奋斗。

长期的基层工作，使他学会怎样识别干部。他的原则是：守摊的不行，捣乱的不行，嘴上会说，光讲原则话的人也不行，要找创业的人。他相信，榆堡二万五千社员中一定有这样的干部。可是谁也没有想到，他从开除党籍的干部中选中了三个人。这三个大从土改起就当干部，有经验，能计划，干劲足，工作都

是一流的。为什么开除党籍呢？张洪山一查，第一个是四清运动中下台的，开除党籍，材料不实；第二个是因为反对平调，被开除出党；第三个说是叛徒，要查去根本没有那回事。党委讨论时，张洪山说：“要给他们恢复党籍，让他们出来工作，我们急需敢挑重担的人。这些年把干部都搞苦了，这样下去谁还当干部？我看嘴上说一千句爱护干部，不如办一件实事。如果县里不批，我们就重新发展他们入党。”

张洪山在干部问题上有一套想法，第一，第一把手要是能东打西杀的人物，有魄力，实干。只要具备这一点，老干部起用，年轻人提拔。

我们在采访中会见了两位这样的第一把手，一个是太子务大队的党支部书记崔永成，一个是公社化工厂的厂长形成国，都是三十多岁，精明强干，事业心很强。小崔是复员军人，上任四年，力排众议，平了二千亩沙地，粮食增产百分之六十，收入翻了一番，威信大增。形成国是一个很有经济头脑的农民。我们谈到工化市场时，他发表了自己的见解，说：“我看出工业的调整，质量是根本。质量上去，厂子就要垮。你光靠数量或者用行政手段去支持，都不灵，一到市场上，立见分晓。”当初张洪山看中了这两个年轻人，说明他确有识人的眼力。

第二是安排老干部。新陈代谢是事物发展的规律。有一部分老干部，解放初期很英雄，干劲大，有政绩，现在有人精力不济，有人思想保守，有人是“维持会长”，当了几代子弟，老是吃返销粮。他们没有太大的毛病，不过是有“相形见绌”罢了。张洪山说：“他们年轻的时候也是东打西杀过来的，为党为民辛辛苦苦干了一辈子，到老了，党不能撇手不管。他们的原则是：凡是老干部都安置，到公社企业来当个副手，到千亩果园来，你能领导就领导，你能剪枝就剪枝。”并且风趣地说：“都不能了，吃苹果也行。”

第三是体贴和照顾困难的困难。每年春节，公社对确有困难的干部，给予补助，使他们的收入不低于全公社的平均水平。张洪山有一句名言：干部越是清白，越有困难。这话一传出来，社员听了点头，干部听了动心，说他懂得基层干部的甘苦。

四、许不许可赚钱？

张洪山一个重要的特点是，看准了的事情，敢于坚持干下去，不怕承担责任。

榆堡公社的工副业现在有点名气，报上也介绍过，说是靠发展工副业，六年摘掉了穷困的帽子。我们也参观了一些社队企业，有的初具规模，有的还很简陋，但都办得红红火火。现在，六十多个大小企业，经营铸造、电镀、化工、塑料制品、金属加工、玻璃仪器等二十多个项目，收入占全公社总收入的一半，六年中共获利润一十万元。可是当初张洪山提出要办工副业的时候，许多人手里还是捏了一把汗。

六年前，张洪山就看出，光靠种粮食，榆堡翻不了身。没有钱，他的五年计划也无法实现。干部和社员不是不懂这个道理，无非是怕“资本主义”帽子。

一天，张洪山转到公社的管井厂，因为那里都完了，没有活路。张洪山问他们一年赚多少钱，工人说都快失业了。张洪山说：“不赚钱你们干嘛？”有个工人出了个主意：“要是许可赚钱，搞个渔具厂准赚钱。”

张洪山琢磨着“许可”两个字，许不许呢？明明社队都穷得叮当响，就是不敢去赚钱，这就象明饿着肚子不准人家吃饭一样，马克思主义有这种道理吗？许不许可赚钱，在一次会上张洪山郑重地提出让大家研究。这件事在当时非同小可。有人劝张洪山，钓鱼可是资产阶级的玩艺，你把支队的管井厂改成供资

产阶级玩乐的渔具厂，没有十成的把握，你要倒霉的！

善于冒险的人是绝不去冒这个风险的。可是张洪山想的是，榆堡公社现在需要钱，不需要利，为什么要图那个支农的虚名而放弃对农民有实利的事不干呢？张洪山说：“我看可以干，没有十成把握有九成也行。我办了渔具厂，赚了钱，平地、修渠、买机器，你说是为资产阶级服务？我就不信。”

张洪山说得对。实践证明，榆堡公社的工副业大大巩固了集体经济，长了社会主义的志气。六年来，榆堡公社靠以副养农，平了一万亩沙地，修了四条渠、三条路，建立了千亩果园，大大改善了生产条件。沙地种花生，油料总产量增加了一倍；八十四华里的排灌渠，扩大了小麦种植面积，总产由五百万斤增加到一千二百万斤。从前，榆堡社员吃玉米还不足。现在，全部细粮化了。一九七四年全公社人均收入七十四元，一九七九年增加到一百四十元。去年年底分给，榆堡大队第三生产队收入千元以上的二十三口。张洪山请来了喜洋洋的三队社员，在公社礼堂开个庆祝会，又邀请所有的干部、生产队干部前来观摩助兴。张洪山即席讲了一篇话。其中有两句话人们记得最清楚，他说：“一个公社书记最高兴的事，就是看到社员富起来了。”是的，张洪山和他的战友们带领二万多群众，经过六年的奋斗，终于由穷变富，榆堡公社从全县倒数第一，而变为名列前茅。

这使我们想起采访中数次听说过的一件事：张洪山曾经在全公社大会上不止一次地郑重宣布过：“我们党委都下了决心，既不想外调，也不想高升，除非我们犯了罪该干不了这个工作之外，我们就打算在这几十年一輩子。”这种精神使人感动。我们很想探问一下他的内心世界。

五、人民·党·乌纱帽

晚上，我们围炉谈心。问题一个接一个开门见山地向他提出来。

我们问：“在榆堡公社六年，你经常想到的是什么？”

张洪山答道：“上任之初，我就想过县委派我来干什么，党委书记是干什么的？这六年里，我不断地想这个问题。”

“是否已经有了答案呢？”

“不敢说。不过我想，人们很容易接受一个事实：党委书记有权。这不假。老百姓要办事就找你批准，你不批，办不了事。但是，有权力必有义务。我想，一个党委书记，不应该老是想着权力，要把思想放在义务上，用手中的权力来尽自己的义务。”

“怎样理解这义务呢？譬如你自己。”

“我是老好地：怎么能让粮食多打点，钱多挣点，对农民有好处的事多办点。”

“你认为公社书记和农民是什么关系？”

“这个问题很重要，摆不正这种关系，书记也当不好。按我想，简单说，书记既是领导者，又是为农民办事的勤务员。”

“有些事情，如果上级不同意办或者上级要办的，农民不愿意怎么办呢？”

“这种情况总感到，‘四人帮’时期就更多了。我的想法，第一从实际出发，第二从群众利益出发。”

我们继续谈下去，谈到了党群关系，谈到乌纱帽，也谈到事实求是。张洪山沉默了很久，仿佛在思考着什么，然后说了一番感人肺腑的话：

“我是在永定河边长大的。永定河两岸尽是穷人。我母亲要过桥，我小时候给八路军跑信，我父亲是村干部。有一天，地主带着还乡团来抓我父亲，我后

来的岳父为了掩护我父亲，被敌人绑在树上活活烧死，我岳母和他十三岁的女儿跪在树前，刀压着脖子，但是一句话也没说。因为这种遭遇，我们两家才成了一家，我长大后，娶了他的女儿。

我们这一带是国共两党拉锯战地区，哪个穷人没有心酸的事！后来我当过乡长，当过公社粮库主任，我一直忘不了这些事情。我岳父一家三口都是普通百姓，他们为什么不顾自己的身家性命？不就因为我父亲给他们代表党么？党又是代表人民的，为人民谋利益的，所以人民热爱共产党，盼八路军来，能过个好日子。我现在受命当了二万多口人的家，算是共产党的代表，如果不能使老百姓生活过得再好一些，要我干什么呢！”

“至于乌纱帽，我是这样看：榆堡这地方为什么要有一个党委呢？因为这里有二万多人，没有人民，党委还能存在吗？我常常想起我岳父，不是他一个人，是整整一代人，他们宁肯牺牲自己，也不肯做有害党和人民的事。现在如果我真明知不对，也闭着眼睛照办，自己保了乌纱帽，坑了群众，那还算共产党吗！”

六、不搬家的理由发人深思

张洪山的妻子是个普通的社员，挣工分吃饭，家住十余里外的一个普通社，他们至今两地分居。张洪山自己一副铺盖卷住在很简陋的办公室里，在食堂吃饭。榆堡大队党委书记记几次三番让他把家迁来，他都不肯。于是我们问他：“为什么不肯把家迁来？有个照顾，对工作也有利嘛！”

张洪山说：“恰相反，对工作很不便利。我家那个大队很穷，而榆堡大队是榆堡公社最富的大队，许多干部都想迁来，我不准，如果我带头迁来，那么我讲话还有什么说服力呢？我是党委书记，我应该用自己的行动，争取群众拥护共产党。如果我的行动叫群众摇头泄气，会使大家怀疑，那就会使我们丧失领导群众的资格。党的干部，如果你也为自己，我也为自己，他也就为自己，谁为人民？说得再严重些，如果所有的公社书记都为自己，共产党就要垮台，你信不信？”

张洪山的话使人恍然大悟。他的思想远不止是洁身自好，他的目光要远大得多，他从实践中体会到党群关系关系到党的事业的成败，因此他毫不留情地情愿牺牲个人利益。这是真正的牺牲。事后我们找人算了一笔帐，张洪山是二十二级干部，工资五十九元。他家里去年劳动所得一万六千个工分，分得二百几十元。这一万六千个工分如果在榆堡大队，可以得到一千五百元。这意味着什么呢？如果张洪山肯迁家于榆堡大队，等于每月增加收入一百元，等于提为一个十三级干部。

可是张洪山却笑着说：“大家都富了，还能穷了我吗？那时我如果缺钱用，找哪个社员借点也行哩。”

读者现在可以明白，为什么有那么多人不愿意张洪山调走。心中装着人民的人民，人民是不会忘记他的。

七、附记

稿子写成后，我们又访问了大兴县委，听两位主要负责同志谈了对张洪山的印象。他们的看法对本文是一个重要的补充，特此简要叙述如下：

第一，张洪山接近群众，村里不管老小都能说上话，比较能了解群众的愿望和呼声。他这个处理问题能实事求是，从实际出发做情报。他提出母猪换牛、允许社员开垦小片荒地和花生管理定额到户等问题，开头，县委都没有表态，后来经过调查，认为办法可行，群众拥护，也适合目前生产力发展水平。

第二，有人说张洪山坑上，这种看法不正确。今年县委号召推广大寨玉米播种新技术，榆堡公社行动最快；凡事用嘴碰，榆堡公社领先。张洪山是很积极的，凡事要分析，不能一概而论。

第三，张洪山也有缺点，说话不留余地，有时情绪急了一些。但是，他办事果断，不拖泥带水，这是好的。我们有些同志，大事不操心，小事斤斤计较，办事拖拖拉拉，留的余地太多。这种作风也是要不得的。

